

在互联网里长大的“00后”，说起长征，大多能背出教科书上的时间、地点、事件、结果和意义。

这是历史的框架，但不是全部。

90多年前，20多万红军将士在枪林弹雨中踏上漫漫征途，他们中的大多数，没能走到终点。那些倒在长征路上的年轻人，很多比今天坐在教室里的青年学子还要小。

只有走进历史的细节与温度，人物身上的精神力量才会呼啸而来。

2026年6月起，长江日报联合武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、中国地质大学(武汉)马克思主义学院发起“重逢·青年学子重走长征路”专访活动，近200名年轻大学生奔赴长征路，追寻烈士足迹，用青春的脚步，去与90多年前同样年轻的他们重逢。

十七棵松树前，我理解了信仰的重量

赵伟峰[中国地质大学(武汉)地理与信息工程学院本科生]

那是一个寻常的下午，我来到江西省瑞金市叶坪乡黄沙村下辖的华屋村，映入眼帘的是十七棵沿山坡排开的松树，每一棵都挂着一个写着名字的小木牌。华质彬、华钦梁、华钦材、华崇宜……17个名字，17个再也也没有回来的人。

讲解员说，20世纪30年代，华屋村只有43户人家。扩红的时候，村里把仅有的17名青年送进了红军队伍。1934年长征出发前，他们相约来到后山，每人种下一棵松树。17个人里，最年长的39岁，最小的只有15岁。他们约定：等革命胜利了一起回来看看。如果谁回不来了，活着的人要替牺牲的兄弟照顾好父母，照顾好这些松树。

松树还活着，17个人没有一个回来。

我在那棵写有华崇宜的松树前站了很久。华崇宜当年只有15岁，放在今天，不过是名中学生。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，这十七棵松树之所以被称为“信

《十送红军》唱出于都河畔的深情

王萱[中国地质大学(武汉)地理与信息工程学院本科生]

“一送里格红军，介个介下了山。”

在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贡江镇长征第一渡的渡口旁，我们和当地老人一同唱起了这首《十送红军》。悠长朴素的歌声飘向贡江，瞬间把我拉回到92年前那个充满不舍与坚守的深秋。

1934年的深秋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，红色苏区陷入危局。8.6万中央红军将士陆续集结于都河畔，即将开启一场艰苦卓绝的远征。沿河村庄家家户户把家中的门板、床板、房梁拆卸下来，扛向河岸；800多条渔船从各处河面汇集过来，有的用作浮桥基座，有的承担摆渡任务。

年过七旬的曾大爷，拍出了给自己准备的寿材木板。红军战士再三推辞，老人却恳切地说道：“红军战士连性命都可以奉献出来，我几块棺材又算得了什么。”这是危难时刻的家国大义，更有百姓对这支革命队伍最朴素的认同。

我又想起那首《十送红军》。歌谣里藏着送别的泪水，藏着百姓的奉献，藏着战士的决绝。军队扎根人民，人民托举革命。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，最后

25岁，我们还是学子，而他牺牲在长征第一天

肖薇[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在读]

25岁的他，还是在为论文犯愁。25岁的他，已是红军战士，并在长征第一天，把生命留在了突围的路上。时隔92年，我们平均年龄20岁出头的7个人，穿过蜿蜒的山路，来到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新田镇白石村，去与一位年轻人重逢。

他叫洪超，是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第一位师长。
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主力于都出发，踏上漫漫征途。10月21日上午，红四师在白石村与守敌交战，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打响。

师长洪超亲临前线指挥，不幸被流弹击中，壮烈牺牲，年仅25岁。洪超是湖北黄梅人。1930年起，他历任红三军团团副、师级主管，能征善战，是彭德怀麾下赫赫有名的猛将。1933年阜台岗战斗，他身负重伤，永久失去了左臂，成为著名的“独臂师长”。40多年后，彭德怀元帅临终前仍反复嘱托：“不要忘记洪超，他是我们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个师长。”

我们上了围树山，重走“长征第一仗”的战场。

我们躬着腰，缓步前行，不到半小时就步履沉重，汗流浃背。而92年前，红军将士从这里，一走就是二万五千里。

洪超牺牲后，战友嘱托当地村民陈观晋代为安葬。为躲避敌人搜查，只坐了一座无名土坟，不能立碑，不能留名。

没有一场胜利赢得理所当然

金可悦[中国地质大学(武汉)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生]

去贵州省遵义市之前，我一直觉得自己对遵义会议已经足够熟悉。“生死攸关的转折点”“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”……现在回想，那时的我，把历史想得太简单了。历史没有那么多理所当然，现在看来正确无比的道路，放在当时都是充满未知的艰难探索。

刚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时，我并没有多么激动。直到走到娄山关大捷展厅时，我才第一次真正停了下来。枪炮声和呐喊声在展厅里响起，旁边的沙盘上，娄山关的地形和兵力部署被清楚地标示出来。过去在书本上看到“娄山关大捷”时，我下意识地以为赢得很轻易，从未想过胜利也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。

遵义会议已经召开，可转机并没有立刻出现，会议后的第一仗土城战役反而出师不利。紧接着的娄山关战役，也没有因为后来进入入书而变得如履平地。遵义会议开完了，困难并没有

最熟悉的赤水，最震撼的重逢

周渝东(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)

四渡赤水是长征中最著名的篇章。去重逢历史书上熟悉的四渡赤水时，我却被另一种感受震撼。

假期，我来到贵州习水红军游击支队陈列馆。

1935年2月20日，中央红军二渡赤水，向桐梓疾进。80多名干部和战士被从军委纵队中抽调出来。大部队继续向前，他们留在了黔北。领头的人叫陈宏，湖北沙市人。

陈宏的生年没有确切记载，只知道1932年参加红军，长征出发时任中央纵队第二梯队参谋主任，1935年2月奉命组建黔北游击队。他鲜有照片和遗物，从沙市到习水的千里征程未被记载，牺牲前的遭遇也无人知晓。

当年，长征的大部队从黔北经过，穿越于山路之间。陈宏和80多名战士的任务，是留下阻击追兵。现在的我们当然知道红军最终会一路北上抵达陕北，可对1935年2月的陈宏而言，一切都是未知。

“接到留下的命令，他是怎样的心情呢？有没有动摇和犹豫？”想到这里，我更加意识到“留下”的艰难。

“重逢”系列是全新的，它让我们看到“年轻人眼中的长征一代”。有人在一张年轻的旧照片前久久伫立，因为对比自己还小；有人蹲在一座沉默的无名墓碑前，第一次掂出“牺牲”两个字的重量；有人爬上夹金山，为当年衣衫单薄的战士红了眼眶；有人走进吴起镇，为胜利会师的前夜久久感叹……一路上，学子们看到的不是“长征精神”四个字，而是与他们同龄甚至更年轻的人，在艰难和迷茫中，从未熄灭的信仰，从未停下的脚步。

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，每一代人都要过好自己的一代。今天不必翻雪山、过草地，但是征程中的年轻人同样有“看不清”“扛不住”“要不算了”的时候。能否以崇高信仰、必胜信念、坚强意志走下去，红军当年答过的题，今天依然要用行动作答。

走下去，他们就在这；走下去，就是历史中最好的重逢。

念树”，不是因为种树的人坚信自己能活著回来，而是因为他们坚信——即便自己回不来，他们所相信的那个未来也一定会来，相信这条路走得通，相信后人会替自己看到胜利的那一天。

长征的胜利，从来不只是以活着回来的人衡量的。那些倒在路上的红军将士，共同构成了这场伟大远征的精神底色。

在华屋村，每年清明，村民们到后山松树林祭拜；新人结婚，要到后山祭奠英烈；开学第一课，村小组则师生到松树林上课；入队、入团、入党，都要在“信念树”下宣誓。这些松树早已不是普通的树，它们是村庄的祠堂，是族谱，是活着的纪念碑。

“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，就永远不会熄灭。”华屋村的十七棵松树，就是那团火还在燃烧的证据。我们这一代要做的，不是把那团火供起来，而是接过它，在自己的路上继续走。

我在面临选择的时候，看到他选择了“牺牲”

郭义曦[中国地质大学(武汉)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生]

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的泽根村不大，家家户户门口挂着五颗红旗。院子里坐着一位老人指了指楼后的山坡，说马登洪的家就在那里。马登洪这个名字，我第一次见到是在纪念馆里。说明牌很简短：红军向导，当地群众，人称“马灯红”。

马登洪是泽根村的藏族青年，家里穷，从小给土司放牛，夹金山的每道沟、每面坡他都翻。1935年红军刚来的时候，村里人都躲到山上去了，马登洪没躲，他看见红军不抢东西、不逼老百姓家，就站了出来，说“我给你带路”。

6月的夹金山，山下热得穿单衣，山顶的雪却没到膝盖。马登洪提着自家那盏马灯走在最前头，路窄的地方，他就让战士们拉着前面人的衣角，一个跟一个。风大的时候，他把马灯揣在怀里挡风，只露出一点亮光。战士们就跟着那点光，一步一步往上挪。

第二天，我动身前往夹金山，到了垭口，寒风仍裹挟着刺骨的冷意，空气稀薄，走几步便要停下来喘气。

90多年前，战士们就是从这里翻过去的。他们穿草鞋、着单衣，雪盲了，就互相扶着走；冻僵了，就搓一搓接着走。有人坐下歇口气，就再也没站起来。

他们在面临选择的时候，看到他选择了“牺牲”

曹楷瑞(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)

我第一次看见吴焕先烈士的名字，是在一页长长的湖北籍长征英烈名单上。他1907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四角曹门村，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新县一带，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5年8月，他牺牲在长征途中，时年28岁。

吴焕先烈士纪念馆里，一盏他曾使用过的油灯引起我的注意。资料上说，他曾借着灯光查看地图、起草文件。我不由得想象，一个20多岁的青年在微弱的灯光下研究地图，规划部队的行进路线。面对艰难局势和沉重责任，这个年轻人是否也曾感到压力与无助？

我们这一代人也常常谈“选择”：选择学校、城市、职业和未来。但我们的选择有着更多的可能和更高的容错，有时甚至可以从头再来。而在吴焕先的年代，选择革命意味着无路可退。

当年，他带头把自家的田地分给农民，烧掉租约、债据，也因此招致反动势力疯狂报复，家中6位亲人惨遭杀害。

他们距离长征胜利，只差一步

周文霖(海南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)

陕北的清晨，我们前往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。1935年10月，中央红军的队伍沿着这些沟壑进入陕西省延安市吴起镇，结束了长征的最后一段。

90多年前，这些战士大多20岁出头，他们跋涉到陕北，经历了大大小小数百场战役，翻过了雪山过了草地，走完了最险的路，却倒在胜利前夜。

在“切尾巴”战役专题展区，锈迹斑斑的马刀、残缺的军号和泛黄的电报稿把我们带回到1935年10月的吴起镇。10月21日，战斗全面打响。红军采用分路包抄、相机包围的战术，步兵追着骑兵打，其中就有第二纵队第十大队的大队长黄珍。

黄珍是湖北省阳新县人，1928年入党，1930年参加红军，历经战火考验，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。在吴起镇，黄珍率第十大队冲锋在最前面，不幸牺牲。同他一起牺牲的，还有多位红军指战员。

讲解员轻声说道：“他们距离长征胜利，只差一步。”

是啊，只差一步。“越是接近终点，越容易出现退缩的心理，可黄珍等人偏偏冲在了队伍的最前面。这时候，我才终于明白什么叫‘不怕任何艰难险阻，不惜付出一切牺牲’。这是只有红军才拥有的坚强品质，只是为了民族利益和革命事业，没有谁会计较个人得失。

长征已是历史，但长征精神永不过时。每当我们遇到挫折、感到疲惫，都可以从先烈的事迹中汲取精神养分。功成不必在我，功成必定有我。奋斗的价值，就在于过程中自己付出了多少努力。

我不自觉地握紧了手里的土：要把土带回去，把故事带回去，把90多年前那些年轻的生命所坚守的信念带回来。

长征精神也写在跨越世纪的守护中

黄心妍(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本科生)

踏上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阳湖坪街道的土地，溪水缓缓流淌，仿佛还回荡着90多年前红二、红六军团抢渡渡水时的枪炮声。

1935年11月，红二、红六军团开始长征，渡水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第一道天险。对岸峭壁林立，船只尽数被敌人收缴，国民党军凭仗江河屏障布下严密封锁。红十七师四十九团团长王烈临危受命，担当抢渡渡水的先遣任务。

初次强渡受挫，王烈迅速调整战术，筹备发起第二次强攻。他把指挥任务交给政委，自己身先士卒，不幸被敌人击中，永远留在了渡水之畔。作为红二方面军长征中牺牲的第一位团长，他只有23岁。

山河铭记，百姓不忘。村民跨越世纪的默默守护，是人民群众最质朴的敬意。长征精神不只写在书本文字里，还刻在山野的烈士墓碑上，流传在老百姓代代相传的故事里。

无名不等于忘记

张朋(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本科生)

我的家乡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，那里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最后出发地——茨岩塘。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的最后一支长征队伍就是从这里出发的。

12月8日，红十八师完成掩护主力任务，从茨岩塘突围，成为最后一支长征的红军部队。湖北宣恩紧邻茨岩塘，当年有大量湖北宣恩籍青年就地参军，随部队征战。

长大后我来到武汉求学，偶然得知湖北宣恩青年李德安曾在茨岩塘浴血奋战、以身殉国，却由于战争条件的艰苦，遗体未能送回湖北故土，只能就地安葬。我希望借着回家的机会，寻访这位先烈。

我先后走访了本地烈士陵园和红军烈士陵园，却始终没有找到李德安的名字，于是走进茨岩塘红色革命博物馆，向管理员询问李德安烈士的安葬信息。他告诉我，陵园集中安葬、立碑纪念的，均有史料记载、籍贯可考、遗骸留存本地的龙山籍烈士。许多当年随军转战至此、战斗牺牲的红军战士，因时局动荡、史料缺失、遗骸难寻，最终没能拥有一方墓碑，李德安烈士或许便是其中之一。

沮丧之时，当地人告诉我，后山深处有一处密陵园，是早年红军将士的安葬旧址，或许留有无名英烈的遗迹。我踏着崎岖的山路向上攀登，历经一番辗转，终于抵达后山陵园。陵园静谧，没有整齐林立的墓碑，没有清晰镌刻的姓名。整片山野之间，唯一一座高大肃穆的无字碑静静矗立，独守青山。

面前的这座无字碑恐怕也不是李德安的墓，却是万千无名英雄的归宿。李德安是许许多多烈士的缩影，他们的故事无人知晓，身后没有墓碑甚至没有姓名，唯有一股赤诚热血，保佑山河无恙、国家安宁。

此次寻访，我始终没能找到李德安烈士的墓碑。无名不等于没有价值。我会永远记得，在家乡的某处，长眠着一位叫李德安的宣恩青年，为保卫我的家乡献出了所有。

策划：曹珊、丁夔
统稿：刘翔、刘家欣

近两百名青年学子重走长征路

重逢

陕西甘泉

大会师

瓦窑堡会议

激战腊子口

过草地

懋功会师

红四方面军出发地

爬雪山

飞夺泸定桥

强渡大渡河

彝海结盟

巧渡金沙江

四渡赤水

遵义会议

通道会议

湖南桑植

红二、红六军团出发地

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最后出发地

(1935·12·9·龙山茨岩塘)

湘西龙山茨岩岩塘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最后出发地。

湘江战役

江西于都

中央红军出发地

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

在赣州市信丰县围龙岭，瞻访“长征第一仗”的旧战壕。